

毛泽东为黄埔军校招生

杨庆旺



黄埔军校旧址

读者看了这个题目,可能怀疑搞错了,毛泽东怎么能给蒋介石当校长的黄埔军校招生呢?我负责地对您说,这是真的,确有其事。

这件事发生在一九二四年三月。当时毛泽东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任中央局秘书,还是国民党一大刚选出的候补执行委员,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代理文教科主任、组织部秘书。三十一岁的毛泽东,这颗年轻的政治明星,冉冉升起在中国的天空,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内都让人刮目相看。

当时国共合作刚刚开始,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广州创办了一所新型的军事政治学校,孙中山任总理,蒋介石、廖仲恺分别任校长和党代表。很多共产党人也在里工作,如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恽代英等都曾在校任职。

既然办学校,肯定就要招生。招生范围当然是在全国了,谁来招生呢,当然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了。不过这时候很多共产党员同时又是国民党员,共产党的干部又是国民党的干部,一般都以国民党的身份出现。

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城市,是非常重要的革命中心,当然也是招生的重点区域,甚至招生办和考场也设在这里。这么重要的一项工作谁来负责呢?从共产党来说,毛泽东是秘书,负责中央日常工作,这类事让他办当属于正当范围;从国民党来说,他是上海执行部文教科代理主任、组织部秘书(负责组织部日常工作),人们更忘不了毛泽东是师范学校毕业的。所以双方领导都认为他办这件事最合适。

毛泽东刚刚参加完国民党一大,他知道这是国共合作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一大大期间孙中山亲

自宣布建立的学校,专门培养军事政治人才的。共产党不仅要支持而且还要参与这项工作。所以他很认真地对待这项工作。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对此也是很重视的。三月十三日,召开第三次执行委员会会议,专门研究了招生事项,并决定由毛泽东具体负责考试工作。

招生之事,各级党组织早已开始,各地区都选派一批青年党团员或积极分子,准备送到军校去培养。三月上旬,应招的北方青年陆续到了上海。

三月十四日,毛泽东在环龙路四十四号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热情地接待了前来参加招考的共产党员张隐韬、杨其纲等。毛泽东让他们做好准备,迎接考试。

来上海应考的都是小青年,大多没见过世面,也没经历过军校考试,心里没谱,也想找找熟人,走走“后门”。湖南地区前来应考的第一子、陈作为等,知道毛泽东在上海负责考生复试工作,

便想走走这位老乡的门子。他们把湖南党组织的公函和报考名单一起交给毛泽东,同时凑到跟前小声说:毛委员,我们都是湖南来的,大家积极性都很高,都想杀敌报国,又没有基础,怕给“考下来”,请你多照顾呀!

毛泽东和蔼地对他们说:大家的积极性是好的,我一定主持公道,不让大家吃亏。你们也要看到,来考试的人很多,条件也很严,主要凭成绩录取,而且考试组织周密,领导重视,不可违犯规定。所以,你们要把精力放在考试上。告诉大家,好好复习功课,沉着冷静应考,争取考个好成绩。

根据广州黄埔军校招生规定,上海地区的招生考试工作,紧张有序地进行。三月末进行了数、理、化各科考试,同时进行政治条件审查。四月初基本结束,凡合格者都发了旅费和证明书,而后在广州进行全国总复试。

在接见即将赴广州参加总复试的学生时,毛泽东向大家表示

祝贺,同时又告诉他们继续做好考试准备,勇于闯关,争取最后胜利。还鼓励大家,如果进了军校,更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学习,严格训练,都要争取当将军,当元帅,多为国立立功。

毛泽东的招生考试工作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在毛泽东负责考试的学生中后来出了多少将军、元帅,我没有专门的研究统计。其中确实招了一位未来的元帅我是知道的,这就是徐向前。

这是徐帅自己在回忆录中说的。他说:黄埔招生是全国范围的,各省份均分配了名额,上海考区是一个比较集中的点。国民革命政府设有办事处,负责招收北方的学生。

二月份,我和白龙亭……乘车赴上海。

三月中旬,我们在上海环龙路一号(疑是四十四号)上海执行部,或单设的考场——作者注)进行了初试。考试前大家心情比较紧张,政治方面看了些报纸和书,还比较有底,作文也不怕,数理化就不行了。谁知,初试比较容易,这一关顺利通过。山西来应试的共十来个,都被录取了。接着招生委员会给每个人发了一点路费,大概是十多块钱,要我们到广州参加复试。

徐向前当时也不可能想到,负责考试工作的竟是他后来的统帅毛泽东!

对在上海黄埔招生一事,毛泽东也津津乐道。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八日,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他高兴地说:

我还曾经在上海为黄埔招过一期学生,地址是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

(摘自《读·党史》)

景德镇是千年瓷都,应该是中国最有文化的几座名城之一。之前从书上读到“景德镇”这三个字时,我无比的向往。当接触到英文学习时,最先知道的单词就是“CHINA”,竟也和景德镇有关。景德镇有千年传承的瓷情画意,有优秀的瓷工画匠,每一道制瓷工序在景德镇的大街小巷里演绎得淋漓尽致。到近现代,有江西瓷业公司,建国后有十大瓷厂,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都有过一段光辉的历史。然而,现在的景德镇却失去了从前的光彩。究其原因,在于景德镇有文化,却缺少文化人,缺少真正的文化人和学者。景德镇需要一种具有鲜明的研究方向,及能够引领和带动区域文化的思想。

和很多人一样,最初了解景德镇这个地方是因为景德镇陶瓷学院副院长陈雨前教授。尽管那个时候“景德镇学”还只是萌芽阶段,但与我私交甚笃的几位前辈早已提到过他的事迹。在来景德镇之前,就听说景德镇有位孔子式的教授——陈雨前。

陈雨前与景德镇结缘纯属偶然。幼年时期的磨难与痛苦、少年时期的坎坷与奋发、青年时期的坚毅与执着使得他在景德镇一步步走向理想的人生境界成为必然。一九六二年陈雨前生于江

西省余江县,同那个年代大多数知识分子家庭一样,童年的他如同汉乐府《孤儿行》中“大兄言办饭,大嫂言视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儿泪下如雨”,然而不同于其他人的是,他无比坚强与韧性。

一九八五年,景德镇陶瓷学院企业管理系第一次招生。这年的七月二十五日,陈雨前来到陶瓷,成为该系的第一位大学语文课教师。这次偶然的“第一”,使陈雨前

这个名字和景德镇结下不解之缘。一九八九年,秋叶正红时,一段在景德镇雕塑瓷厂的谈话应该永远载入中国陶瓷文化史册。时任厂长的刘远长对陈雨前说:“景德镇最富有的是千年的文化,陶瓷文化在这里博大精深。这里有一流的考古学家、陶瓷艺术家、瓷工画匠,群星璀璨,但唯独缺乏文化学家、陶瓷艺术理论家。”这时,夕阳的余晖洒在窗外火红的枫叶上,一种庄严、神圣而又沉甸甸的感觉在陈雨前心底油然而生。

陈雨前是陶瓷诗词研究第一人,他在九九四年编写的《中国历代陶瓷诗词评析》和《景德镇陶瓷诗萃》即是国内最早从批评家、理论家。”这时,夕阳的余晖洒在窗外火红的枫叶上,一种庄严、神圣而又沉甸甸的感觉在陈雨前心底油然而生。

在进入陶瓷文化研究领域后,陈雨前在一九九六年编写了《中国景德镇陶瓷作品选》和《中国景德镇艺术陶瓷精品选》,选取一百位艺术家的五百件陶瓷艺术作品,中英文对照,并同年在上海举行首发式,次年在国家历史博物馆举办北京首发式。

陈雨前多年来一直关注着景德镇瓷业和文化的走势。十多年前,面对景德镇瓷业经济不景气,国企解体、职工下岗,部分人悲观地认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历史条件变了,瓷都地位的转移也在情理之中,因而消极观望。然而,陈雨前并不这样看,通过大量调查研究,撰写了长文《谁能拯救景德镇》。在“前言”中他痛切地呼吁:“景德镇陶瓷目前的整体情况,着实堪忧,若果按照这种趋势走下去,不能力挽狂澜创

造性地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滑坡和不景气的态势将无可挽回地持续下去。假如真的出现令人痛心事情的话,我不知道我们这一代人将如何面对,将如何面对我们的祖先,将如何告诉我们的子孙,将如何对我们的历史、对我们的祖国负责。”

于是,陈雨前开始了其“景德镇学”的艰难跋涉。“景德镇学”是以复兴中国陶瓷文化为宗旨,以

提出了“景德镇学”的学术概念。同年九月初,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完成了对“景德镇学”研究课题的论证报告,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景德镇陶瓷文化研究中心于二〇〇六年九月十六日在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正式挂牌成立,并举行了“景德镇学”的首场学术报告会。

“景德镇学”的提出和诞生,既具有偶然性又具有必然性、个体性、时机性。“景德镇学”是景德镇的历史创造的,也是景德镇陶瓷历史和陶瓷文化史创造的,更是景德镇这块土地孕育的。

二〇〇七年,《景德镇学——景德镇之魂》的付梓出版,是要真正地让“景德镇学”的学术理念深入人心,真正地让世人了解、认同、支持和参与“景德镇学”及其研究活动。这本书是陈雨前近年来对“景德镇学”进行探索与研究所形成的研究成果,也是“景德镇学”打造成为真正的国际“显学”方面所迈出的坚实而又重要的一步。

“景德镇学”一经提出,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国内外文化界、艺术界、媒体、科研机构纷纷撰文评论和报道。金维诺先生发表在《景德镇学——景德镇之魂》序言中写道:“景德镇和景德镇陶瓷文化研究,确实需要创新的学术理念和学术思想来把握、来驾驭、来支持、来引领。我觉得书中关于‘景德镇学’的学术构想甚好,这对景德镇陶瓷文化的研究,是一种学术的飞跃,有着深远的意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晋贤先生指出:“书中提出的新颖学说‘景德镇学’,从学术理论上、从生产创作事实上,再次论证了景德镇在中国、在世界陶瓷界、学术界、文化界极具重要性的地位和作用。”

陈雨前告诉我们,他希望“通过‘景德镇学’来总结景德镇陶瓷文化的精神,体现一个学者的使命和责任”。作为“景德镇学”的首倡者和践行者,他的足迹遍布在瓷都的每一条街道弄堂,他的思想影响着陶瓷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然而,他又是孤独的,一位英雄和一座城的传说我们听得太多,他迫切希望“景德镇学”能吸引更多贤人贡献出自己的智慧。陈雨前也多次说过:“景德镇学”不是一个人的,而是景德镇的,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

“景德镇学”给我们以更多的期待。

提出了“景德镇学”的学术概念。同年九月初,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完成了对“景德镇学”研究课题的论证报告,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景德镇陶瓷文化研究中心于二〇〇六年九月十六日在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正式挂牌成立,并举行了“景德镇学”的首场学术报告会。

“景德镇学”的提出和诞生,既具有偶然性又具有必然性、个体性、时机性。“景德镇学”是景德镇的历史创造的,也是景德镇陶瓷历史和陶瓷文化史创造的,更是景德镇这块土地孕育的。

二〇〇七年,《景德镇学——景德镇之魂》的付梓出版,是要真正地让“景德镇学”的学术理念深入人心,真正地让世人了解、认同、支持和参与“景德镇学”及其研究活动。这本书是陈雨前近年来对“景德镇学”进行探索与研究所形成的研究成果,也是“景德镇学”打造成为真正的国际“显学”方面所迈出的坚实而又重要的一步。

“景德镇学”一经提出,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国内外文化界、艺术界、媒体、科研机构纷纷撰文评论和报道。金维诺先生发表在《景德镇学——景德镇之魂》序言中写道:“景德镇和景德镇陶瓷文化研究,确实需要创新的学术理念和学术思想来把握、来驾驭、来支持、来引领。我觉得书中关于‘景德镇学’的学术构想甚好,这对景德镇陶瓷文化的研究,是一种学术的飞跃,有着深远的意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晋贤先生指出:“书中提出的新颖学说‘景德镇学’,从学术理论上、从生产创作事实上,再次论证了景德镇在中国、在世界陶瓷界、学术界、文化界极具重要性的地位和作用。”

陈雨前告诉我们,他希望“通过‘景德镇学’来总结景德镇陶瓷文化的精神,体现一个学者的使命和责任”。作为“景德镇学”的首倡者和践行者,他的足迹遍布在瓷都的每一条街道弄堂,他的思想影响着陶瓷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然而,他又是孤独的,一位英雄和一座城的传说我们听得太多,他迫切希望“景德镇学”能吸引更多贤人贡献出自己的智慧。陈雨前也多次说过:“景德镇学”不是一个人的,而是景德镇的,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

“景德镇学”给我们以更多的期待。

不同的作者,有些作者能写不能赶,有些作者能写又能赶。编辑是与作者打交道的,平日就要与作者交朋友,了解他们的特点,需要约稿时就自如了。

“文革”初期,中国作协所属的《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被迫停刊。一九七六年,《人民文学》、《诗刊》率先复刊,当时中国作协尚未恢复工作,这两份刊物隶属国家出版局。光年同志从湖

跟光年同志学做编辑

吴泰昌

我从事文艺报刊编辑工作的年头不短,先后在《文艺报》、《人民文学》就职,而这两家新中国历史最悠久的文艺期刊的主编正是张光年同志。从一九六四年起,我与光年同志开始接触,可以说,对我工作等多方面有过帮助和影响的领导和前辈中,光年同志是重要的一位。

我到《文艺报》上班没有立刻投入编辑工作,副主编侯金镜同志安排我的第一课,是用一周时间去《文艺报》。一九六一年三月号发表的由光年同志执笔的《题材问题》专论的修改样,厚厚的,有执笔者的多次改样,有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中宣部、党中央有关同志的改样。事后才知道,这是光年同志有意安排的,本意是让我从反复修改的文字中加深对报刊工作的严肃性和重要性。我边看边做笔记,留心一些重要提法是如何被修改得更准确更贴切的。我特别注意文章中形容词的用法,我看到文章的作者和修改者在用词上很讲究分寸。我写文章不大爱用无边的形容词,与工作伊始上的这堂课颇有关系。

我在理论组,但我上班不久,编辑部就派我去采访山西话剧院的《刘胡兰》剧组。从北京到天津,又派我去采访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自编自演的《矿山兄弟》剧组。整整一个月,当我回来汇报这两个戏的演出几乎场场爆满的情况时,光年同志说,你在大学里学习、研究文艺理论多年,对理论的深切鲜活的理解就是要与艺术实践相结合,检验文艺的社会作用,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看读者、观众的直接反应,我们推荐作品,心中就要有这个数。

光年同志平时不大来编辑部,但刊物每期在王府井人民日报印刷厂印的晚上他一般都去。我们这些新来的年轻人有意识被安排去现场习战,校对、复查引文,防备临时换稿。光年桌子上放一杯茶,一盒烟,仔细地翻阅本期大样。他不时地提醒我们编辑工作中该注意的问题。有次他在看袁鹰题为《遥望金鸡》的大样时问我这篇文章怎么到手这么快?他说组稿物色好人选很重要。不同内容不同时间要求的文章要请

北干校回京后,出任出版局顾问,“四人帮”粉碎后,又兼任《人民文学》主编。我在一九七八年六月调回《文艺报》筹备复刊前,在《人民文学》工作,光年同志为落实党的文艺政策,为文艺界老同志尽早恢复名誉、重返文坛耗尽心血,做了大量的工作。《人民文学》连续召开了数次座谈会。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光年同志为促使老舍尽早恢复名誉所做的运筹和决策。一九七七年九月,有天上午他突然叫我去他家,布置我马上

去老舍家,请老舍夫人胡絮青提供一篇老舍生前未发表的短文,体裁不限,散文、随笔、诗歌、快板都可以。下午我去东城丰富胡同老舍家,胡絮青和老舍长女舒济在四处摊满的被抄家退回的书稿中寻找,第二天才找出老舍一九六五年写的两首短诗的手稿,一首题为《昔年》,一首题为《今日》,光年同志决定以《诗二首——老舍遗作》在第十期发表,并决定用事迹刊出。在刊物印时,光年同志亲自看了编辑部加的说明,在老舍名字后面加了“同志”两字,他说,老舍本来就是同志,好同志,好同志被弄成不是同志,蒙冤而死,是一大悲剧!所以现在必须郑重标明“老舍同志”。光年同志又决定《人民文学》一九七八年三、四、五三期连续发表老舍生前未竟稿九万篇小说(正红旗旗下)。光年同志的这些动作,为一九七八年六月老舍正式平反恢复名誉作了舆论铺垫。

一九八三年五月七日,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专程飞抵上海,授予巴金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勋章。六日,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中国作协副主席张光年代表中国作协去上海祝贺。《文艺报》主编冯牧派我跟随光年同志去,为报纸写专题报道。行前,他交代,这不单是巴老的殊荣,也是中国文坛一大喜事,巴老是我们的主席,《文艺报》又是机关报,报道一定要比其他报纸写得详细、充实,当时写,写好请光年同志审定。当我将《巴金获法国荣誉勋章》原稿送光年同志时,他说,详细是做到了,详细的报纸也能做到,要增添点独家的东西,我们有些条件到。第二天,我又去医院看望巴老,他兴奋地说:“我们国家有许多作家、作者值得向国外介绍,要让别人尽可能了解我们。过去我们这方面注意不够。现代文学馆开放后,可以接待世界各地的作家。法国朋友们一定是很感兴趣的。”我将巴老这几句话加在文末,光年同志微笑着说:这篇报道看来是有点独家的东西了,他强调说,记者就要敏锐地捕捉到别人捕捉不到或难以捕捉到的东西。

光年同志主编刊物只是他半个多世纪为社会主义祖国文艺事业所作的诸多工作、诸多贡献中的冰山一角,而我跟他学做编辑点滴,也只是他给我人生有形无形教益的一个方面。



一九八六年,作者与张光年(左)

王芳同志离开我们转眼已经一年多了,总觉得该写点什么,来纪念这位可敬的功勋老人。

按年龄算,王芳同志早我两代,是一位传奇式的革命前辈。在我国革命和建设岁月里,他长期工作在隐蔽战线、公安战线,是我国公安政法战线杰出的领导人。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在解放军三〇五医院。那时我在薄一波同志身边工作,在医院照顾薄老的起居,我们住在医院一层的西段。碰巧王芳同志也在那里住院,他住在东段,就这样见到了他,或许是一种缘分。

后来,就不时听人说起王芳的英雄事迹。渐渐听得多了,觉得很多反映革命战争年代的电影里似乎都有他的身影。比如像《平原游击队》里的魏强等等。虽然是文艺作品里的人物,却都是来自实际生活中的原型。据说,很多年前,就有老战友称他是“活着的李向阳”。在我这样的小战士眼里,这可了不得的荣誉。不过,王芳同志自己却不想接受这样的称呼。他说:“革命工作都是份内事,不值得宣扬。”

我接触过的老前辈领导人中,很多人都是这样。越是了不起,越是不觉得自己了不起。在这个方面,王芳同志尤其典型。我印象中,他高大的身材,宽厚的性格,属于凛然长者,对年轻人有一种发自

内心的爱护和关心。他为我写了一幅字,内容是“志在高远”。字不多,话不长,言简意赅,寄托了对后辈的期望和鼓励,同时也抒发了自己的情怀。听说他在十年动乱时期曾长期遭受迫害,被关押七年之久。能在那样的处境里坚持过来,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继续为国家安全、为人民的幸福工作,一定是有高远志向支撑着他。

以后的多年里,虽然和王芳同志见面并不频繁,但是他的形象、他书写的条幅对我的嘱咐,一直都牢牢记在我的心里。工作顺利、心情愉快时,看看条幅,觉得人生道路还远,要学的知识、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就避免了得意忘形。碰到挫折、情绪不免低落时,也会去看看他写的条幅,就会增加一分坚韧和坚持,不被暂时的困难所压倒。有了这些经历,就更深深地体会到了老家人书写这四个字的深长用意。

当然,以我的阅历之浅,并不足以全部懂得老前辈革命家的情怀。但是,王芳同志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却因这个条幅而保持着丰满和高大的基调。他虽然已经去世,却依然活在我的心中。身材高大,目光远大,胸襟阔大……记得费孝通先生写过一篇怀念前辈的文章,题目是“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这题目意思很深,文字很少,不是我能写出来的。可是,在王芳同志逝世一周年来到这时,我心中的感受似乎就是这样的。

志在高远

怀念王芳同志

孙尚臣



陈雨前策划作品